

美国、战争和 世界霸权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Eric J. Hobsbawm)
顾晓祺 译

论 帝国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上海人民出版社

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著

顾晓祺 译

yamax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 /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著；顾晓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书名原文：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ISBN 978-7-208-17551-8

I. ①论... II. ①埃...②顾... III. ①全球化—研究②国际形势—研究 IV. ①C913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14038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张晓婷

装帧设计 树下无人

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顾晓祺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C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 / 32

印 张 5.5

插 页 2

字 数 109,000

版 次 202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7551-8 / D·3898

定 价 42.00元

yamax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 /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著；顾晓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书名原文：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ISBN 978-7-208-17551-8

I. ①论... II. ①埃...②顾... III. ①全球化—研究②国际形势—研究 IV. ①C913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14038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张晓婷

装帧设计 树下无人

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顾晓祺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C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 / 32

印 张 5.5

插 页 2

字 数 109,000

版 次 202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7551-8 / D·3898

定 价 42.00元

献给伯贝克学院 (Birkbeck)

献给伯贝克学院 (Birkbeck)

前言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凡的时代。这个时代结合了空前的人类灾祸与充盈的物质进步，而我们改变，或者说摧毁我们星球地貌的能力，甚至向外辐射影响外太空的能力，也在此期间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我们该如何回顾这个“极端的年代”，或是如何展望从这一旧时代中浮现的新时代的前景？这本文集是一名历史学家调查、分析和理解第三个千禧年开始时世界的形势以及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主要政治问题的一次尝试。它补充并更新了我早期著作中写就的内容，特别是我关于“短20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的历史书写《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新世纪：与安东尼奥·波利托的对话》（*The New Century: In Conversation with Antonio Polito*）以及《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这样的尝试有其必要。历史学家能为这一课题作出什么贡献？除了记住别人已经忘记或希望忘记的东西外，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尽可能从当代记录中脱身，以更广阔的语境和更长远的视野进行观察。

在这本主要围绕政治主题的研究文集中，我选择了今天需要清晰而明智的思考的五个领域：战争与和平这一宏大问题在21世纪的发展，诸世界帝国的过去与未来，民族主义的性质与其不断变化的语境，自由主义民主的前景，以及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难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发生在一个由两种相互关联的发展所主导的世界舞台之上：一是人类通过技术和经济活动改变地球的能力急剧而持续地加速增长；二是全球化。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项发展尚未对那些政治决策者产生显著影响。最大化经济增长速率仍然是各国政府的施政目标，同时目前也没有任何有效措施来应对全球变暖的危机这一现实前景。而在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目前不受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的主导形势之下，全球化——此处的全球化即是指，整个世界变为承载着不受地方边界阻碍、相互关联的活动的的环境——的加速发展造成深远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此处收录的文章没有具体讨论全球化的这些影响，主要是因为政治是人类活动中唯一几乎不受全球化影响的领域。在量化这一影响的尝试中，瑞士KOF 全球化指数（2007）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衡量经济和信息流动、个人联系或文化传播的指标——例如，人均麦当劳餐厅和宜家家居的数量——但除了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数量、参与国际组织数量以及参与联合国安理会任务的数量之外，它想不出更好的衡量“政治全球化”的指标。

对全球化的通盘讨论可能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关于全球化的三点整体观察与本书主题尤为相关。

首先，当前盛行的自由市场全球化造成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水平急剧上升。尽管极端贫困现象普遍减少，但没有迹象表明这种两极分化不会在国家内部延续。此类不平等的激增，特别是在经济极端不稳定的情况下，像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自由市场造成的情况一样，是新世纪社会和政治主要紧张局势的根源。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能给国际不平等带来压力，这既对北方旧世界人民原先天文数字般优渥的生活水平构成威胁，也使得像印度和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类似生活水平。只要这种压力存在一天，国内以及国际的紧张局势就将延续。

其次，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少的人对此种全球化冲击的感触最深。因此，在那些能够规避其负面影响的人——能把成本外包给劳力廉价国家的企业家、在任何高收入市场经济中都可以找到工作的高科技专业人士和高等教育毕业生——与那些无法如此的人之间对于全球化的看法越来越两极分化。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大多数生活在旧“发达国家”，依靠工资或薪水生活的人来说，21世纪初带给他们的是一个就算不说险恶至少也是令人不安的前景。全球自由市场侵蚀了国家和福利体系保护他们生活方式的能力。在全球经济中，他们得和国外的男男女女竞争，后者与其有着相同的资质，所获薪酬却只需前者薪酬的一小部分；而在国内他们又受到来自全球化的另一种压力，即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后备军”（the reserve army of labour）的来自全球广大贫困乡间的移民。诸如此类的情况可并不预示着一个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年代。

再次，尽管除了在一些面积较小的国家（主要在欧洲）之外，全球化的实际规模仍然不大，但其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却大得不成比例。因此，在西方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移民都是一大政治难题，哪怕世界上居住在非出生国的人口比例还没超过3%。在2007年KOF经济全球化指数中，美国排在第39位，德国在第40位，中国在第55位，巴西在第60位，韩国在第62位，日本在第67位，印度排在第105位，然而除巴西之外，上述所有国家“社会全球化”的排名都要来得更高一些（英国是经济和社会全球化同时排名前10位者中唯一的主要经济体）。虽然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但在短期内，全球化这种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后果。我估计，无论如何，政治方面的阻力虽然不太可能复活正式的保护主义政策，但可能会在未来一二十年里减缓自由市场全球化的进程。

我希望书中关于战争、霸权、帝国、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现状以及公共暴力和恐怖转型的那些章节，无需我的进一步说明，读者就能理解其含义。同样地，我希望关于民主的那两章也能如此，尽管我意识到，试图证明西方庸俗政治话语中最神圣的“奶牛”之一所产出的“乳汁”比通常认为的要少，是一项非常有争议的尝试。如今，比起几乎所有其他词语或政治概念，在西方关于民主的公共话语中，充斥着更多的废话和无意义的胡言乱语，特别是关于选举产生的政府具有神奇品质的那些，而那种政府充其量只是算术上占多数的选民在竞选政党之间作出的选择而已。在最近美国的辞令中，“民主”一词已经完全脱离现实。我这两篇文章在坚定地站在致力于服务人民——一切人民，无论贫穷或富有，蠢笨或明智，见多识广或愚昧无知——并征得他们同意与之磋商的政府一边的同时，是对这一必要任务的些微贡献，即通过运用理性和常识来冷却热潮。

在此收录和在必要处更新的这些作品，大多是针对不同观众的讲演，试图阐述和解释当今世界或其中大部分地区所处的情势。它们或许有助于明确在新世纪开始时我们面临的问题，但它们并没有提出方案或实际的解决办法。它们写于2000年至2006年之间，因此反映了这一时期特定的国际关切，以美国政府在2001年决定维护“单边世界霸权”，通告废除迄今为止接受的国际公约，保留随时发动侵略战争或其他军事行动的权利，并实际如此开战为主。鉴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不再需要证明这一课题不切实际，我们是否希望它取得成功的问题因此就完全变为学术性的。然而，应当很明显的是，读者要记得，我的文章是由一个深刻批判这一课题的作者所写的。这一部分出自自我倔强而坚不可摧的政治信念，包括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无论是那些声称征服他们是在帮助这些受害者的大国，还是那些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安排比其他肤色的人天然优越的白人。这同样也基于对自大狂的合理怀疑，那是国家和统治者的职业病，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或成功没有限制。

自2001年以来，美英两国的政治家、有偿或无偿的拥护者、话术师、公关代表、游说者和业余意识形态专家为美国行为辩护的大多数论点和谎言不再像先前那样拘禁我们的思想。不过，有人提出了一个不那么声名狼藉的观点，不是针对伊拉克战争，而是针对这样一种普遍主张，即在一个全球日益野蛮、暴力和混乱的时代，为维护或确立人权而进行跨境武装干预是正当的，有时是必要的。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世界帝国霸权，特别是由唯一有能力建立这种霸权的大国——美国来行使的世界帝国霸权的可取性。这一被称为人权帝国主义的主张，在共产主义南斯拉夫解体引发的巴尔干冲突，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冲突的过程中，进入了公开辩论之中。其似乎暗示着，只有外部武装力量才能结束无休止的相互屠杀，而只有美国能够并愿意使用这种武力。美国在该地区没有特殊的历史、政治或经济利益，这使得它的干预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显得更为无私。在我的文章中我已关注到了这一立场。虽然我后面的文章，尤其是《传播民主》一文包含了拒斥它的理由，但关于这个立场更多的观察可能并非不合时宜。

这一立场有着根本的缺陷，在于大国在推行其国际政策时确实有可能做符合人权捍卫者形象的事情，并意识到这样做的宣传价值，但这相对于它们的目的来说只是附带性的，而一旦它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就会在今天以20世纪遗留下来的那种残酷野蛮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的。那些以人类伟大事业为核心关怀的人与任何国家之间可能只会是暂时的联盟或对立关系，但绝不会永久地处于同一立场。即使曾有极少数年轻的革命国家真诚地寻求传播它们的普遍性——1792年后的法国、1917年后的俄国，但不包括乔治·华盛顿的孤立主义美国——那也总是短暂的。任何国家默认的立场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

除此之外，武装干预国家事务的人道主义理由基于三种假设：当今世界可能会出现祈求此种人道主义的不可容忍的局势，通常是大规模屠杀，甚至是种族灭绝；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明显大于其代价。尽管所有这些假设有时是合理的，就像关于伊拉克和伊朗的讨论证明的一样，但对于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局势”，人们鲜能达成普遍共识。人们或许能在下面这两个最明显的正当干预案例上达成共识：越南入侵柬埔寨，结束了波尔布特（Pol Pot）骇人听闻的“杀戮战场”（killing fields）政权（1978年），以及坦桑尼亚摧毁伊迪·阿明（Idi Amin）在乌干达的恐怖政权（1979年）。（当然，并不是所有迅速和成功的外国武装入侵都在当地危机局势中产生了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更令人忧心的例子是利比亚、东帝汶。）这两个案例都是通过短暂的入侵实现的，并且两者都产生了直接的好处，可能还带来了一些长久的改善，同时其并不意味着系统性地废除了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既定原则。顺带一提，它们没有帝国主义意图。它们也不涉及更广泛的世界政治。事实上，美国等都继续支持被废黜的波尔布特。像这样的临时干预与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可取性毫无关系。

更何况近年来的武装干预情况并不像上面说到的那样，近期的干预都是有选择性的，并没有涉及按人道主义标准来看最严重的暴行，特别是中非的种族灭绝。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地区，人道主义关切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尽管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然而在波斯尼亚，外部干预或许有助于提前结束当地的流血冲突，而不是让塞尔维

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战争一直持续下去，但该地区仍然动荡不安。同样，根本不清楚1999年的武装干预是不是解决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中一个极端少数群体对塞尔维亚的叛乱所引起的问题的唯一途径，或者实际上是入侵威胁，而不是俄罗斯的外交，才是结束塞尔维亚不妥协态度的原因。这一案例的人道主义基础比在波斯尼亚的情况更令人生疑，由于挑拨塞尔维亚使其大规模驱逐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战争对塞尔维亚长达数月的破坏性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这一武装干预实际上可能恶化了人道主义局势。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因此得以稳定。不过，尽管到目前为止，除了克罗地亚，没有人有理由对结果感到满意，至少对巴尔干半岛的干预是迅速的，在短期内也发挥了决定性效果。

另外，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军事行动，而非美国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行动，尽管人道主义的公众舆论将其正当化了，因为它推翻了一些相当令人厌恶的政权。若不是因为9·11事件，就连美国也不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局势糟糕到需要它立即入侵它们。阿富汗被其他国家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由所接受，而伊拉克则几乎普遍地受到谴责。尽管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政权被迅速推翻，但两次战争都没有取得胜利，当然也没有达到一开始宣布的目标：建立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民主政权，成为该地区其他尚未实现民主的社会的灯塔。两者，尤其是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被证明是冗长的，极具破坏性以及血腥的，并且直至撰写本文时它仍在继续，并无结束的前景。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武装干预都来自拥有优越得多的军事力量和资源的外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干预给出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在所有上述国家中，外国军事占领和政治监管仍在继续。在最好的情况下（但这显然不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结束了血腥的战争，带来了某种和平，但即使是这类正面的结果，如在巴尔干地区，也令人失望。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在伊拉克，没有人会否认，解放人民是这场战争的官方借口，而其处境比以前来得更糟。而近期武装干涉别国事务的行为，即便其来自超级大国，也并不成功。

这一失败部分系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野蛮和暴政的政权不会受到内部变化的影响，因此只有外部力量才能实现其终结，并随之传播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政治或法律制度，而这也是人权帝国主义背后的假设。这些假设继承自冷战战士谴责“极权主义”的时代。它们本不应该在苏联解体后，或者，在1980年后亚洲和南美洲几个曾经令人生厌的非共产主义专制、军国主义和独裁政权已经遭遇的内部民主化进程后存活下来。这些假设还基于下面这种信念，即武力行为可以立即带来重大的文化变革。但事实并非如此。价值观和制度的传播很难通过外部武力的突然施力来实现，除非当地已经具备使之能够适应和被接受的条件。民主、西方价值观和人权无法像某些技术引进一样，后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会被所有能够使用并负担得起它们的人以同样的方式采用，就像和平的自行车和屠戮的AK47，或者像机场这样的技术服务。倘若价值观和制度真能被这样引进，生活在（理论上）相似民主宪法下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众多国家之间将会具有更多的政治相似性。总之，历史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这是我学到的一课，尤其是从经历和反思20世纪的经验中学到的。

最后，感谢那些为首次发表这些研究提供机会的机构。第一章基于一篇在奥斯陆为纪念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座谈会而写的论文。第二章则基于应《印度书评》（*Indian Review of Books*）的邀请，2004年在德里举办的尼克希尔·查克拉瓦蒂纪念讲座（Nikhil Chakravarty Memorial Lecture）讲稿。第三章是2005年在哈佛大学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的演讲内容，第四章是2004年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大学（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荣誉学位授予仪式上的就任演说。第五章是为新版《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Campus Verlag, Frankfurt, 2004）所写序言的细化补充。第六章最初是2000年发表及出版的诗人会社讲座（Athenaeum Lecture）讲稿。第七章是对《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00年9月/10月刊的供稿，该期的主题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思想”；第八章较为久远，最初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恐怖”为主题的研讨会的参会论文所做的一些笔记；第九章是2006年在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暴力”系列公开演讲的一部分；第十章原来是2003年为《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撰写的文章。我还要感谢那些不厌其烦地倾听我的想法并与我讨论发言的同事和其他听众，特别是在新德里、哈佛和纽约的听众。作为一名专业作者，我要感谢我的意大利出版商，他们最早提出这样的作品集的连贯性可以形成一本值得出版的小书，我还要感谢布鲁斯·亨特（Bruce Hunter）和安尼·科利斯（Ania Corless），他们说服了我和其他出版商。

此外，由于本书收录的文章基于不同场合进行的讲座和演说，我应为本书中不可避免的重复内容道歉。我删减了一些重复之处。但是，如果把它们全部剔除，就可能破坏每一章各自论述的连续性，也许还会破坏整本书一体连贯的感觉。或许这些重复之处也有助于舒张某些章节相当紧凑的论述。此外，身为一位无法摆脱“好为人师”的终身习惯——既要说服，又要阐述——的作者，适度的重复是我工具包的一部分。我希望我没有逾越这一限度。

E. J. 霍布斯鲍姆

2007年于伦敦

^[1] KOF即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译者注

^[2] 这项排名系根据2004年的数据得出。

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下去，但该地区仍然动荡不安。同样，根本不清楚1999年的武装干预是不是解决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中一个极端少数群体对塞尔维亚的叛乱所引起的问题的唯一途径，或者实际上是入侵威胁，而不是俄罗斯的外交，才是结束塞尔维亚不妥协态度的原因。这一案例的人道主义基础比在波斯尼亚的情况更令人生疑，由于挑拨塞尔维亚使其大规模驱逐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战争对塞尔维亚长达数月的破坏性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这一武装干预实际上可能恶化了人道主义局势。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因此得以稳定。不过，尽管到目前为止，除了克罗地亚，没有人有理由对结果感到满意，至少对巴尔干半岛的干预是迅速的，在短期内也发挥了决定性效果。

另外，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军事行动，而非美国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行动，尽管人道主义的公众舆论将其正当化了，因为它推翻了一些相当令人厌恶的政权。若不是因为9·11事件，就连美国也不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局势糟糕到需要它立即入侵它们。阿富汗被其他国家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由所接受，而伊拉克则几乎普遍地受到谴责。尽管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政权被迅速推翻，但两次战争都没有取得胜利，当然也没有达到一开始宣布的目标：建立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民主政权，成为该地区其他尚未实现民主的社会的灯塔。两者，尤其是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被证明是冗长的，极具破坏性以及血腥的，并且直至撰写本文时它仍在继续，并无结束的前景。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武装干预都来自拥有优越得多的军事力量和资源的外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干预给出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在所有上述国家中，外国军事占领和政治监管仍在继续。在最好的情况下（但这显然不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结束了血腥的战争，带来了某种和平，但即使是这类正面的结果，如在巴尔干地区，也令人失望。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在伊拉克，没有人会否认，解放人民是这场战争的官方借口，而其处境比以前来得更糟。而近期武装干涉别国事务的行为，即便其来自超级大国，也并不成功。

这一失败部分系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野蛮和暴政的政权不会受到内部变化的影响，因此只有外部力量才能实现其终结，并随之传播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政治或法律制度，而这也就是人权帝国主义背后的假设。这些假设继承自冷战战士谴责“极权主义”的时代。它们本不应该在苏联解体后，或者，在1980年后亚洲和南美洲几个曾经令人生厌的非共产主义专制、军国主义和独裁政权已经遭遇的内部民主化进程后存活下来。这些假设还基于下面这种信念，即武力行为可以立即带来重大的文化变革。但事实并非如此。价值和制度的传播很难通过外部武力的突然施力来实现，除非当地已经具备使之能够适应和被接受的条件。民主、西方价值观和人权无法像某些技术引进一样，后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会被所有能够使用并负担得起它们的人以同样的方式采用，就像和平的自行车和屠戮的AK47，或者像机场这样的技术服务。倘若价值和制度真能被这样引进，生活在（理论上）相似民主宪法下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众多国家之间将会具有更多的政治相似性。总之，历史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这是我学到的一课，尤其是从经历和反思20世纪的经验中学到的。

最后，感谢那些为首次发表这些研究提供机会的机构。第一章基于一篇在奥斯陆为纪念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座谈会而写的论文。第二章则基于应《印度书评》（*Indian Review of Books*）的邀请，2004年在德里举办的尼克希尔·查克拉瓦蒂纪念讲座（Nikhil Chakravarty Memorial Lecture）讲稿。第三章是2005年在哈佛大学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的演讲内容，第四章是2004年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大学（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荣誉学位授予仪式上的就任演说。第五章是为新版《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Campus Verlag, Frankfurt, 2004）所写序言的细化补充。第六章最初是2000年发表及出版的诗人会社讲座（Athenaeum Lecture）讲稿。第七章是对《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04年9月/10月刊的供稿，该期的主题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思想”；第八章较为久远，最初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恐怖”为主题的研讨会的参会论文所做的一些笔记；第九章是2006年在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暴力”系列公开演讲的一部分；第十章原来是2003年为《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撰写的文章。我还要感谢那些不厌其烦地倾听我的想法并与我讨论发言的同事和其他听众，特别是在新德里、哈佛和纽约的听众。作为一名专业作者，我要感谢我的意大利出版商，他们最早提出这样的作品集的连贯性可以形成一本值得出版的小书，我还要感谢布鲁斯·亨特（Bruce Hunter）和安妮·科利斯（Ania Corless），他们说服了我和其他出版商。

此外，由于本书收录的文章基于不同场合进行的讲座和演说，我应为本书中不可避免的重复内容道歉。我删减了一些重复之处。但是，如果把它们全部剔除，就可能破坏每一章各自论述的连续性，也许还会破坏整本书一体连贯的感觉。或许这些重复之处也有助于舒张某些章节相当紧凑的论述。此外，身为一位无法摆脱“好为人师”的终身习惯——既要说服，又要阐述——的作者，适度的重复是我工具包的一部分。我希望我没有逾越这一限度。

E. J. 霍布斯鲍姆

2007年于伦敦

^[1] KOF即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译者注

^[2] 这项排名系根据2004年的数据得出。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第二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第三章 美国霸权为何与大英帝国有所不同](#)

[第四章 论帝国的终结](#)

[第五章 新世纪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第六章 民主的前景](#)

[第七章 传播民主](#)

[第八章 恐怖](#)

[第九章 暴力年代中的公共秩序](#)

[第十章 持续扩张的帝国](#)

[索引](#)

[译后记](#)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第二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第三章 美国霸权为何与大英帝国有所不同](#)

[第四章 论帝国的终结](#)

[第五章 新世纪的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

[第六章 民主的前景](#)

[第七章 传播民主](#)

[第八章 恐怖](#)

[第九章 暴力年代中的公共秩序](#)

[第十章 持续扩张的帝国](#)

[索引](#)

[译后记](#)

第一章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军士兵

20世纪是有史以来最暴虐的世纪。由20世纪的战争造成或与之关联的死亡人口估计达1.87亿，相当于1913年时全世界人口的10%以上^[]。如果将这个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开始，那么这将是一个战争几乎没有间断的世纪，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某个地方发生有组织的武装冲突。这个世纪被世界大战所主宰，也就是说被领土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所统治。从1914年到1945年的这段时间可以被单独看作是一场“三十年战争”，只在20世纪20年代，从1922年日本最终从苏俄远东地区撤军到1931年日本开始进攻中国东北的这段时间有过中断。紧随其后，几乎是立刻，大约四十年的冷战开始了：这符合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对战争的定义，即“不仅存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相信的一段时期之中”。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武装部队在全球各地参与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世界大战时代的延续，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然而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欧洲、非洲、西亚和中亚充斥着正式或非正式的军事冲突。自1914年以来，整个世界一直未能维持和平，而现在也同样如此。

然而，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地理上来说，这个世纪都无法被视为一段同质的时期。从时间上看，其分为三个时期：以德国为中心的世界大战时代（1914—1945年）、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时代（1945—1989年）以及经典国际权力体系结束以来的时代。我将这些时期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一方面，从地理上看，军事行动的影响极不均衡。除了一次例外（1932—1935年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进行的查科战争〔the Chaco War〕），20世纪的西半球（美洲）没有发生过除了内战之外的重大国家间战争。敌人的军事行动几乎没有触及这些领土——因此，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飞机撞击后，举世震惊。自1945年以来，国家间战争在欧洲也消失了，在此之前，欧洲一直是主要战场。虽然在第三阶段，战争又回到了东南欧，但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战争似乎不太可能重演。另一方面，在第二阶段，与全球对抗没有必然关联的国家间战争仍然普遍存在于中东和南亚，而直接源于全球对抗的大战也存在于东亚和东南亚（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与此同时，在第一阶段，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地区相对而言未受战争影响（除埃塞俄比亚在1935—1936年被意大利殖民征服，但时间较迟），但其在第二阶段成为武装冲突的战场，并在第三阶段直面屠杀与苦难。

20世纪战争的另外两个特点尤为显著，相对而言第一点没有第二点明显。一方面，在21世纪初，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武装行动基本上不再掌握在政府或其授权的代理人手中，除了愿意使用暴力之外，交战各方没有共同的特征、地位或目标。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国家间战争在战争的图景中占据了如此之大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内战或现有国家或帝国领土内的其他武装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了。只要无法与国际冲突分割开，即使是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帝国内部的内战，以及中华帝国崩溃后发生的内战，都会被纳入国际冲突的框架。另一方面，在20世纪，拉丁美洲可能没有军队跨出过国界，但该地区却成了重大国内冲突的现场：举例来说，1911年后的墨西哥、1948年后的哥伦比亚，以及第二阶段期间的中美洲各国。尚未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战争的数量持续下降，但国内冲突较之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变得越发普遍。这一时期国家边界内的冲突数量持续急剧上升，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趋于稳定。^[]

更明显的是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之间的区别被削弱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席卷交战国的所有人口；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都蒙受了苦难。然而，随着20世纪的进展，战争的重压越来越多地从武装部队转移到平民身上，他们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且渐趋沦为军事或军事政治行动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对比显得颇为引人注目：在前一次大战的死亡人口中只有5%是平民；而在后一次大战中，这一数字上升到66%。而时至今日受战争影响的平民所占比例一般估计为80%至90%。冷战结束以来比例有所增加，是因为自那时以来，大多数军事行动不是由应征入伍的军队进行的，而是由相当小规模的正规或非正规部队进行的，这些部队往往使用高科技武器，以规避伤亡风险。虽然高科技武器确实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得以重新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目标，从而区分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但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平民将仍然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

此外，平民的痛楚与军事行动的规模或强度之间不成正比。就严格的军事标准而言，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东巴基斯坦独立进行的为期两周的战争不算大战，但却产生了1000万难民。20世纪90年代，非洲武装部队之间的战斗规模最多涉及数千名武装匮乏的战斗人员，但其在高峰期却产生了近700万难民——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冷战期间的任何时候，在当时该大陆甚至还是超级大国之间代理人战争的战场。^[]

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贫困偏远的地区。在某些方面，由于全球化和世界日渐依赖于持续不断的通信、技术服务、交付和供应流，战争对平民生活的影响被放大了。即使是其相对短暂的中断——例如，9·11事件后美国领空关闭的几天时间——也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相当巨大的，甚或是长足的影响。

如果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区别像20世纪初，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s）编纂战争规则时所设想的那样清晰，那么在20世纪书写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就会容易得多。彼时冲突被认为主要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或者如果冲突发生在一个特定国家的领土内，则交战双方也是高度组织化的，因此其交战地位会被其他主权国家认可。战争被认为与和平截然不同，一端是宣战，另一端是签订媾和条约。公约设想军事行动可以清楚地区分作战人员和非作战平民，前者身着制服或佩戴有组织武装部队的其他标志。战争应当在作战人员之间进行。战时非作战人员应得到尽可能的保护。众所周知，这些公约并未涵盖一切国内和国际的武装冲突，尤其是那些因西方国家在不被国际公认为主权国家管辖的地区进行帝国扩张而产生的冲突，哪怕其中一些（但绝非全部）冲突的确被称为“战争”。它们也没有涵盖针对既存国家的大规模叛乱，如所谓的“印度兵变”；也不包括国家或名义上实行统治的帝国当局无法有效控制的地区经常发生的武装活动，例如阿富汗或摩洛哥山区的袭击和流血冲突。尽管如此，《海牙公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仍然被视为指导方针。但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相对清晰被混乱所取代。

首先，国家间冲突和国家内部冲突之间，即国际战争和内战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因为20世纪的特点是其不仅是战争的世纪，而且是革命和帝国解体的世纪。一个国家内部的革命或解放斗争会对国际形势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冷战期间。相反，在俄国革命之后，至少在那些看起来相对没有风险的地方，国家干预自己不赞成的别国内政变得司空见惯。今日情况依旧如此。

其次，战争与和平之间明显的区隔变得模糊不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处战场都既始于宣战，也终于媾和。然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很难被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或是和平，因此不得不发明新词“冷战”来描述它。自冷战以来，从中东目前的事态就可以看出这一区隔已完全模糊。在伊拉克战争之前，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都无法正确描述海湾战争正式结束以来的伊拉克局势——这个国家仍然几乎每天都遭到外国列强的轰炸。这两个术语也无法完全适用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或以色列与其邻国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20世纪世界大战的不幸遗产，也是战争日益强大的大众宣传机器以及一个互不相容同时充满激愤的意识形态相互对抗时期带来的遗产，这种意识形态对抗为战争带去了类似于过去宗教冲突的讨伐元素。与国际权力体系下的传统战争不同，这些冲突越来越多的为了无法协商的目的，如“无条件投降”。由于战争和胜利都被认为是全面和彻底的，任何根据18世纪和19世纪公认战争惯例，对交战国获胜能力的限制，甚至是正式宣战，都被否决了。对胜利者维护其意志的权力的任何限制也是如此。经验告诉我们，和平条约中达成的协议可能会被轻易撕毁。

近年来，由于公开言论开始倾向于使用“战争”一词指代部署组织化力量以针对被视为反社会的各种国家或国际活动，例如“打击黑手党的战争”或“打击毒品卡塔尔的战争”，情况业已变得更为复杂。不仅战争一词的含义变为与主要的战争行动大相径庭的、控制甚至消灭这类组织或网络（包括小规模恐怖组织）的斗争，而且这混淆了两种武装力量的行动。一种——让我们称他们为“士兵”——针对其他武装力量，带着击败对方的目的。另一种行动——让我们称之为“警察”行动——着力于在一个现有的政治实体（通常是一个国家）内维持或重建必要的法律和公共秩序。不带有必然道德含义的胜利，是前者的目标；将触犯法律的人绳之以法则后者的目标，而这确实具有某种道德含义。

然而，两者只是在理论上更容易被区分，在实践层面则很难判定。不像所有正常运作的领土国家中的凶杀案，士兵在战斗中杀人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如果爱尔兰共和军（IRA）成员认为自己是作战人员，但英国官方法律认为他是杀人犯呢？北爱尔兰的军事行动是像爱尔兰共和军认为的那样是一场战争，还是联合王国的一个省份面对违法者维持有序政府的努力呢？由于30年来被动员起来对抗爱尔兰共和军的不仅有强大的地方警察部队，而且还有国家军队，我们可能会因此得出结论称这是一场战争，但它像警方行动一样，以尽量减少伤亡、避免干扰该省生活的方式系统地运作。最后，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如其他事例一样，至2006年都没有带来和平，只是延长了不再发生战斗的时间。这就是21世纪初和平与战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混乱性。美国及其盟国正在进行的军事和其他行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与整个20世纪一样，现在完全没有任何能够控制或解决武装争端的有效全球权威。全球化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经济、技术、文化，甚至语言——除了一个方面：政治和军事。领土国家仍然是唯一有效的权威。联合国统计大约有近200个国家，但实际上强国寥寥无几，其中美国绝对是这些强国中最强大的。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或帝国强大到足以维

持对政治世界的霸权，更不用说在全球建立政治和军事优势了。世界太大，太复杂，太多元。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可以想象的单一国家权力不可能建立持久的控制，即使其抱负如此。

单一超级大国无法弥补全球权威的缺失，尤其是考虑到缺乏有足够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能使大国自愿接受——例如与国际裁军或武器控制有关的公约。存在一些这样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各种技术和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法庭。但是，除了国家之间的协定赋予它们的权力，或由于强大国家的支持，或国家自愿接受的权力之外，没有一个机构拥有任何有效的权力。尽管这或许令人遗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

由于只有国家才掌握真正的权力，因此国际机构在试图处理战争罪等罪行时可能会失去效力或缺乏普遍合法性^[4]。即使是根据普遍协定设立的国际法庭（例如，根据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罗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只要强国能做到无视它们，它们的判决也不一定会被认为合法或具有约束力。强权国家的联合体可能足够强大到能确保来自较弱国家的一些罪犯被带到这些法庭，也许可以遏制某些地区武装冲突的残酷状况。然而，这仍是在国际国家体系内传统地行使权力和影响力，而不是行使国际法的例子。^[4]

但是，21世纪和20世纪两者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像下面这样的观点已经不再适用，即战争爆发在一个由有效政府的领土区域划分的世界中，这些政府垄断了疆域内的一切公共权力和胁迫手段。这种国家范式从来就不适用于正在经历革命的国家，或者是分崩离析的帝国的碎片，但直到最近，大多数新的革命或后殖民政权——1911年至1949年的中国是其主要的例外——都相当迅速地成为了或多或少有组织和有效运作的新政权和国家。

但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领土国家已经失去传统上对武装力量的垄断，失去了过往的稳定和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基本的合法性，或者至少是被接受的永久性，而正是后者允许政府将税收和征兵等负担强加给愿意的公民。个人现在普遍可以轻易获得战争的物质装备，也有途径资助非国家性的战争。借此，国家和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变得更加严重，可能持续几十年而没有任何胜利或解决希望——如克什米尔、安哥拉、斯里兰卡、车臣、哥伦比亚。在极端情况下，如在非洲部分地区，国家可能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如在哥伦比亚，它对其部分领土可能不再能行使权力。即使在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也很难消灭小型的非官方武装团体，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的埃塔（ETA，“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这种情况的新奇之处在于，面对恐怖袭击，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感到有必要对一个既没有领土又没有可识别军队的小型跨国非政府组织或网络发起正式的军事行动。

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下个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天平？我不愿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或其可能的结果作出预测。然而，由于主权国家世界体系的转变，武装冲突的结构和解决方法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

苏联的解体意味着统治国际关系近两个世纪的，以及除了明显的例外，对国家间的冲突行使了一定控制的大国体系不复存在了。该体系的消失消除了对国家间战争和对其他国家事务武装干预的主要限制——在冷战期间，外国的领土边界基本上没有被武装部队所跨越。然而，即使在那段时间，国际体系也潜在地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小国，有时是相当弱小的国家成倍增加；尽管相当羸弱，但它们仍然是联合国的正式“主权”成员。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明显加剧了这种不稳定。在迄今为止稳定的民族国家，如英国、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各种分离主义倾向也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稳定。与此同时，世界舞台上私人角色的数量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冷战结束后跨境战争和武装干预的次数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什么机制能控制和解决这种冲突？过去的记载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卷。20世纪90年代的武装冲突没有一次以稳定解决而告终。冷战机构、冷战假想和冷战话语的遗留使旧有怀疑继续存在，加剧了后共产主义时代东南欧的解体，并使这个曾经被称为南斯拉夫的地区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要建立某种控制武装冲突的手段，就必须摒弃这些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假想。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美国以单边力量强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任何形式的）的尝试已经失败，并且不可避免地将会失败，无论目前权力关系如何有利于它，哪怕它有着一个（不可避免地短暂的）联盟作为后盾。国际体系将仍然是多边的，其监管将取决于几个主要单元彼此达成一致的能力，哪怕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享有军事上的主导地位。美国采取的国际军事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与其他国家的谈判协议，这一点已很明显。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战争的政治解决方式，即使是美国卷入的战争，也将通过谈判，而不是单方面强加。以无条件投降为结局的战争时代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重现。

我们还必须重新考虑现有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始终存在，并且通常被呼吁去行使其职能，但在解决争端中它却没有明确的作用。它的战略和运作总是受制于变动不居的权力政治。缺乏一个真正被认为是中立的、能够在没有安全理事会事先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國際仲裁机构，是目前这套争端管理系统最明显的缺陷。

自冷战结束以来，对和平与战争的管理一直是即兴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如在巴尔干地区，武装冲突被外部武装干预所阻止，敌对行动结束时的状况由第三方军队维持。这种长期干预已经被个别强国在其影响范围内应用了许多年（例如，叙利亚对黎巴嫩）。然而，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形式，只有美国及其盟友实行过这种做法（有时是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有时不是）。迄今为止，各方对结果都不满意。因为这要求干涉者在它们没有特殊利益和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地区无限期地维持军队并为此付出代价，并且使它们依赖于被占领人口的被动服从，但这一点是没办法确保的；一旦出现武装抵抗，小规模武装“维和部队”必然会被大得多的部队所取代。穷国和弱国可能会反感这种干预，认为这是殖民地和保护国时代的一种回响，尤其是在当地经济的大部分都寄生在占领军的需求上时。从这种干预中会否产生未来控制武装冲突的一般模式尚不明确。

21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将取决于内部稳定与对军事冲突的规避，而不是设计得更有效的谈判和解决机制。除了少数例外，今天不太可能发生过去导致武装冲突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摩擦。例如，政府之间在国际边界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变得极少。但另一方面，国家内部冲突却很容易变得暴虐。战争的主要危险就在于外部国家或军事行动者卷入此类冲突。

与贫穷、高度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的国家相比，经济繁荣稳定、居民之间商品分配相对公平的国家在社会和政治上可能不会那么动荡。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则将削减和平的可能。不过，避免或控制国内武装暴力更直接地取决于国家政府的权力和高效运作以及它在大多数居民眼中的合法性。今天，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把欧洲大部分地区习以为常的那种存在大量手无寸铁的平民人口或具备高度公共秩序的情况视为理所应当。今天，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忽视或消灭内部武装少数民族。然而，世界越来越多地被划分为有能力有效管理其领土和公民的国家——哪怕其面临着内部敌人数十年的武装行动，就像英国一样——以及越来越多的被束缚在官方所认可的国际边界所包围的领土之内的国家，其政府从弱小、腐败到根本不存在。这些地区产生了血腥的内部斗争和国际冲突，正如我们在中非地区看到的那样。遗憾的是，在这些地区，仍缺乏持久改善的前景，这些不稳定国家中央政府的进一步削弱，或者世界地图的进一步巴尔干化，无疑将增加武装冲突的危险。

初步预测：21世纪的战争不太可能像20世纪那样凶残。但是，武装暴力造成的巨大的痛苦和损失，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将无处不在，并且持久泛滥——甚至偶尔带有传染性。这个世纪和平前景渺茫。

^[1] 估算自Z.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1993)；人口总数估算自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2001), p. 241。

^[2] 参见Stiftung Entwicklung und Frieden, *Globale Trends 2000: Fakten, Analysen, Prognosen* (Frankfurt a/M, 1999), p. 420, Schaubild 1。

^[3] 数据来源于UNHCR,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2000: Fifty Years of Humanitarian Action* (Oxford, 2000)。

^[4] 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指南为Roy Gutman and David Rieff (eds), *Crimes of War: What the Public Should Know* (New York and London, 1999)。

^[5] 根据定义，这也是个别国家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在其国家法庭上单方面宣称有权对其他国家的公民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尤其是像西班牙法院在英国上院的支持下，在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Pinochet）的案件中所做的那样。

持对政治世界的霸权，更不用说在全球建立政治和军事优势了。世界太大，太复杂，太多元。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可以想象的单一国家权力不可能建立持久的控制，即使其抱负如此。

单一超级大国无法弥补全球权威的缺失，尤其是考虑到缺乏有足够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能使大国自愿接受——例如与国际裁军或武器控制有关的公约。存在一些这样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各种技术和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法庭。但是，除了国家之间的协定赋予它们的权力，或由于强大国家的支持，或国家自愿接受的权力之外，没有一个机构拥有任何有效的权力。尽管这或许令人遗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

由于只有国家才掌握真正的权力，因此国际机构在试图处理战争罪等罪行时可能会失去效力或缺乏普遍合法性^[4]。即使是根据普遍协定设立的国际法庭（例如，根据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罗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只要强国能做到无视它们，它们的判决也不一定会被认为是合法或具有约束力。强权国家的联合体可能足够强大到确保保来自较弱国家的一些罪犯被带到这些法庭，也许可以遏制某些地区武装冲突的残酷状况。然而，这仍是在国际国家体系内传统地行使权力和影响力，而不是行使国际法的例子。^[5]

但是，21世纪和20世纪两者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像下面这样的观点已经不再适用，即战争爆发在一个由有效政府的领土区域划分的世界中，这些政府垄断了疆域内的一切公共权力和胁迫手段。这种国家范式从来就不适用于正在经历革命的国家，或者是分崩离析的帝国的碎片，但直到最近，大多数新的革命或后殖民政权——1911年至1949年的中国是其主要的例外——都相当迅速地成为了或多或少组织和有效运作的新政权和国家。

但在过去30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领土国家已经失去传统上对武装力量的垄断，失去了过往的稳定和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基本的合法性，或者至少是被接受的永久性，而正是后者允许政府将税收和征兵等负担强加给愿意的公民。个人现在普遍可以轻易获得战争的物质装备，也有途径资助非国家性的战争。借此，国家和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变得更加严重，可能持续几十年而没有任何胜利或解决希望——如克什米尔、安哥拉、斯里兰卡、车臣、哥伦比亚。在极端情况下，如在非洲部分地区，国家可能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如在哥伦比亚，它对其部分领土可能不再能行使权力。即使在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也很难消灭小型的非官方武装团体，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的埃塔（ETA，“巴斯克祖国与自由”组织）。这种情况的新奇之处在于，面对恐怖袭击，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感到有必要对一个既没有领土又没有可识别军队的小型跨国非政府组织或网络发起正式的军事行动。

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下个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天平？我不愿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或其可能的结果作出预测。然而，由于主权国家世界体系的转变，武装冲突的结构和解决方法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

苏联的解体意味着统治国际关系近两个世纪的，以及除了明显的例外，对国家间的冲突行使了一定控制的大国体系不复存在了。该体系的消失消除了对国家间战争和对其他国家事务武装干预的主要限制——在冷战期间，外国的领土边界基本上没有被武装部队所跨越。然而，即使在那段时间，国际体系也潜在地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为小国，有时是相当弱小的国家成倍增加；尽管相当羸弱，但它们仍然是联合国的正式“主权”成员。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明显加剧了这种不稳定。在迄今为止稳定的民族国家，如英国、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各种分离主义倾向也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稳定。与此同时，世界舞台上私人角色的数量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冷战结束后跨境战争和武装干预的次数增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什么机制能控制和解决这种冲突？过去的记载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卷。20世纪90年代的武装冲突没有一次以稳定解决而告终。冷战机构、冷战假想和冷战话语的遗留使旧有怀疑继续存在，加剧了后共产主义时代东南欧的解体，并使这个曾经被称为南斯拉夫的地区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

如果我们要建立某种控制武装冲突的手段，就必须摒弃这些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假想。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美国以单边力量强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任何形式的）的尝试已经失败，并且不可避免将会失败，无论目前权力关系如何有利于它，哪怕它有着一个（不可避免地短暂的）联盟作为后盾。国际体系将仍然是多边的，其监管将取决于几个主要单元彼此达成一致的能力，哪怕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享有军事上的主导地位。美国采取的国际军事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与其他国家的谈判协议，这一点已很明显。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战争的政治解决方式，即使是美国卷入的战争，也将通过谈判，而不是单方面强加。以无条件投降为结局的战争时代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重现。

我们还必须重新考虑现有国际机构，特别是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始终存在，并且通常被呼吁去行使其职能，但在解决争端中它却没有明确的作用。它的战略和运作总是受制于变动不居的权力政治。缺乏一个真正被认为是中立的、能够在没有安全理事会事先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仲裁机构，是目前这套争端管理系统最明显的缺陷。

自冷战结束以来，对和平与战争的管理一直是即兴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如在巴尔干地区，武装冲突被外部武装干预所阻止，敌对行动结束时的状况由第三方军队维持。这种长期干预已经被个别强国在其影响范围内应用了许多年（例如，叙利亚对黎巴嫩）。然而，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形式，只有美国及其盟友实行过这种做法（有时是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有时不是）。迄今为止，各方对结果都不满意。因为这要求干涉者在它们没有特殊利益和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地区无限期地维持军队并为此付出代价，并且使它们依赖于被占领人口的被动服从，但这一点是没办法确保的；一旦出现武装抵抗，小规模武装“维和部队”必然会被大得多的部队所取代。穷国和弱国可能会反感这种干预，认为这是殖民地和保护国时代的一种回响，尤其是在当地经济的大部分都寄生在占领军的需求上时。从这种干预中会产生未来控制武装冲突的一般模式尚不明确。

21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将取决于内部稳定与对军事冲突的规避，而不是设计得更有效的谈判和解决机制。除了少数例外，今天不太可能发生过去导致武装冲突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摩擦。例如，政府之间在国际边界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变得极少。但另一方面，国家内部冲突却很容易变得暴虐。战争的主要危险就在于外部国家或军事行动者卷入此类冲突。

与贫穷、高度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的国家相比，经济繁荣稳定、居民之间商品分配相对公平的国家在社会和政治上可能不会那么动荡。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则将削减和平的可能。不过，避免或控制国内武装暴力更直接地取决于国家政府的权力和高效运作以及它在大多数居民眼中的合法性。今天，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把欧洲大部分地区习以为常的那种存在大量手无寸铁的平民人口或具备高度公共秩序的情况视为理所应当。今天，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忽视或消灭内部武装少数民族。然而，世界越来越多地被划分为有能力有效管理其领土和公民的国家——哪怕其面临着内部敌人数十年的武装行动，就像英国一样——以及越来越多的被束缚在官方所认可的国际边界所包围的领土之内的国家，其政府从弱小、腐败到根本不存在。这些地区产生了血腥的内部斗争和国际冲突，正如我们在中非地区看到的那样。遗憾的是，在这些地区，仍缺乏持久改善的前景，这些不稳定国家中央政府的进一步削弱，或者世界地图的进一步巴尔干化，无疑将增加武装冲突的危险。

初步预测：21世纪的战争不太可能像20世纪那样凶残。但是，武装暴力造成的巨大的痛苦和损失，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将无处不在，并且持久泛滥——甚至偶尔带有传染性。这个世纪和平前景渺茫。

^[1] 估算自Z.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1993)；人口总数估算自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2001), p. 241。

^[2] 参见Stiftung Entwicklung und Frieden, *Globale Trends 2000: Fakten, Analysen, Prognosen* (Frankfurt a/M, 1999), p. 420, Schaubild 1。

^[3] 数据来源于UNHCR,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2000: Fifty Years of Humanitarian Action* (Oxford, 2000)。

^[4] 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指南为Roy Gutman and David Rieff (eds), *Crimes of War: What the Public Should Know* (New York and London, 1999)。

^[5] 根据定义，这也是个别国家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法，并在其国家法庭上单方面宣称有权对其他国家的公民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尤其是像西班牙法院在英国上院的支持下，在皮诺切特将军（General Pinochet）的案件中所做的的那样。

第二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我要讨论的主题是战争、和平与霸权，但我将会像历史学家的做法一样，从过去的视角来说明当下的问题。我们无法谈论世界在政治方面的未来，除非我们牢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时期，亦即这个人类社会和生活的变化进程以及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正以惊人的步频加速的时代。如今，它正以一种危及人类和自然环境的速度推进。当柏林墙倒塌时，某位轻率的美国人旋即宣告了历史的终结，所以我不愿采用这个已经明显不足信的短语。尽管如此，从20世纪中叶起，我们确实进入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这给我们所熟知的过去一万年的历史，亦即人类开始定居、从事农业以来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我们尚不知道我们将去向何处。

在我“短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我曾试图勾勒出世界历史这一突然和戏剧性的断裂。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转型显而易见。仅考虑通信革命的速率，就实际上已经消解了时间和距离。到2004年互联网才刚刚走过第十个年头。在书中我还特别指出了这一转型与国际未来相关的四个社会意义上的面向。这四个面向是直到19世纪还是人类主体和经济基础的农民的急剧衰落；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相应崛起，特别是人口以八位数计的超级城市；口头交流的世界被普遍通过手写或机器阅读和书写的世界所取代；以及最后，女性状况的转变。

在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人数明显下降。如今¹，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这一数字仅占从业人口的4%，在美国仅占2%，在其他国家这一数字的变化也同样显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仍有5个国家有半数以上的从业人口以务农维生，美洲则有11个国家，亚洲有18个国家以及（除了3个例外，即利比亚、突尼斯和南非的）非洲所有国家。今天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实际上，现在欧洲或美洲没有一个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农业人口，而伊斯兰世界也是如此。就连巴基斯坦，这个数字也跌破了50%的关口。而土耳其的农民人口也从四分之三变为三分之一。甚至农业在东南亚的主要堡垒也从几处隘口被攻破：印度尼西亚从67%降至44%，菲律宾从53%降至37%，泰国从82%降至46%，马来西亚从51%降至18%。到2006年，就连中国——1950年中国85%的人口是农民——也降至50%左右。其实，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之外，目前农民社会仅剩的牢固堡垒——也就是说，农业人口在2000年超过从业人口60%的地方——就只有英法从前的南亚帝国：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中南半岛的国家。但是，鉴于工业化的加速，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而如今，这一比例分别降至8%和10%。过不了几十年，我们将不再是人类出现以来的样子，不再是那个主要从事采集、狩猎或生产食物的物种。

我们也将不再是农乡物种。1900年，全世界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195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不到26%；如今，这一比例仅略低于二分之一（48%）²。在发达国家和全球许多其他地方，即使是在农业生产区，农村也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沙漠。在那里，车外和小聚落外几乎看不到人类的行踪。但是在这里要如此推断城市化的未来殊为不易。诚然，旧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很高。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不再构成当前城市化的典型特征，现在城市化的形式是农村不顾一切地跃升为我适才称呼的超级城市。发达国家的城市，即使是正常增长的城市，所面临的也只是围绕着最初的一个或多个中心的城郊区。今天，世界上前50大城市中只有10个、世界上18大城市中只有2个位于欧洲和北美。超过百万、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除了一个例外（葡萄牙的波尔图），都位于亚洲（20个）、非洲（6个）和拉丁美洲（5个）。无论城市化的其他后果如何，这一进程都极大地改变了高度集中的城市人口和地理上分散的农村人口之间的政治平衡，特别是在选举代表大会或总统的国家。

关于教育变革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因为普遍识字的社会、文化影响，不容易与我们都身处其中的公共和个人通信媒体的突然而完全前所未有的革命的社会、文化影响分开。且让我仅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如今，有20个国家，超过55%的就学年龄人口在中学毕业后选择继续学习，但除了韩国以外，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即旧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创造人力资本的能力方面，旧的发达世界仍然大幅领先21世纪主要的新兴国家。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多快能够赶上来呢？

关于20世纪最伟大的那项社会变革，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说一个观点来补充我刚才说的内容：衡量女性解放最好的标准是她们赶上甚至超过男子教育的程度。难道我还需要在印度强调世界上有些地方仍然严重落后这一点吗？

让我从鸟瞰过去半个世纪左右前所未有的转变的视角降回地面，来仔细看看在21世纪初影响战争、和平和权力的因素。总的趋势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指南。例如，显而易见的是，在20世纪的进程中，除美洲外的世界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世袭君主或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进行从上到下压倒性的统治。全世界人口现在生活在一个严格地说是独立国家的集合中，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援引“人民”或“国家”来宣称合法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包括所谓的极权主义政权），它们通过真实或虚假的选举或公民投票，和（或）象征着当局和“人民”之间联系的大规模定期公共仪式来宣称合法性。不管怎样，人们从臣民变为了公民——包括在20世纪期间，这一转变不仅包含男性，还包含女性。但是，严格按法律来说，大多数政府目前都有不同形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宪法，并进行竞选，尽管有时会因军事统治而暂停，后者虽然被认为是暂时的，但往往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今天距离以上的现实有多远呢？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可以观察到一种普遍趋势：独立领土国家本身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它曾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政治和制度单元。在它的起源之地，在北大西洋地区，其起步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几项创新。它垄断了权力和强制的手段——武器、武装人员、监狱——并通过中央权威及其代理人，在收集信息的能力日益增强的基础上，对国家领土上发生的事情行使越来越强大的控制权。它的活动范围及对其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大，凭借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该政体对其居民的动员也同样越发成功。这一阶段的国家发展在大约40年前达到顶峰。

一方面，想一想20世纪70年代西欧的“福利国家”，其中“公共消费”（即用于公共目的而非私人消费或投资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约占20%至30%。接着另一方面，再想想公民不仅愿意让公共当局向他们征税以筹集业已如此庞大的资金，而且愿意在20世纪的大战中被征召，为他们的国家战斗和牺牲数百万人。两个多世纪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国家的崛起一直在持续，而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无关，无论其采取的是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然而现在情况就不同了。这一趋势正在逆转。如今我们拥有迅速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其基础是跨国民营公司，它们尽最大努力存活在国家法律和税收范围之外，这甚至严重限制了大政府控制其国民经济的能力。事实上，出于对自由市场的信奉，各国实际上正在放弃许多最为传统的直接活动——邮政服务、警察、监狱，甚至是其武装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将其让与盈利导向的私人承包商。据统计，目前有3万或更多的这类武装“私人承包商”活跃于伊拉克。³由于这一发展以及冷战期间小型但高效的武器泛滥全球，武装力量已不再由国家及其代理人垄断。甚至像英国、西班牙和印度这样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也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一个由政治异见者组成、实际上又无法消灭（如果不是真正威胁到国家的话）的武装团体长期共同生活。我们看到，出于各种原因，许多联合国成员国迅速解体，其中大多数但并不全部是20世纪帝国解体的产物。在此类情况中，名义上的政府无法管理或实际控制国家大部分领土和人口，甚至是它们自己的政府机构。

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生活在其领土上的人们，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臣民，越来越拒绝接受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不再自愿承担对统治当局及其法律的义务。如果大多数时候广大民众缺乏将任何实际建立的国家权力接受为合法权力的意愿，那么即便是相对少数的外来政权，即19世纪或20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也将无法存在。过去，只有在如阿富汗和库尔德斯坦等罕有的完全不愿响应此种意愿的地区，外国势力才会彻底倾家荡产。但是，正如当前伊拉克的情况所展示的，面对权力，甚至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人们的自然服从现在已经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的回归也不复可能。公民的服从也在迅速削弱。我非常怀疑今天是否有国家能够征召到义无反顾地准备战斗和为国捐躯的军队来进行大规模战争。现在，没有几个西方国家能够，像大多数所谓的“发达国家”曾能做到的一样，依赖于除开社会秩序边缘的罪犯和其他边缘人口外，基本守法和有序的人口。让公民处于监控之下的技术和其他手段的迅速崛起——全时段监控的闭路电视摄像头、电话窃听、对个人数据和电脑的窃取——尽管减少了公民的自由，却并没有让国家和法律变得更加有效。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全球化急剧加速的时代，这导致全球范围的地区差异，因为全球化本质上带来的是不平衡和不对称的增长。它还凸显出当代生活中屈服于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标准化影响的那些方面（科技、经济、各种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受影响程度较小的文化机构）与未受其影响的那些方面（特别是国家和政治）之间的矛盾。例如，从逻辑上讲，全球化会导致劳动力从较贫穷地区向较富裕地区的流动增加，但这一流动在许多国家（受影响的主要是旧北大西洋地区的富裕国家）造成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局势，尽管从全球来看，这种流动的幅度不大：即使在今日，也只有3%的世界总人口生活在出生国之外。与资本、商品和通信的流动不同，迄今为止，国家和政治在劳动力迁移的道路上设置了强大的障碍。

除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戏剧性的去工业化历程之外，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新失衡现象，是世界经济重心日益从北大西洋沿岸地区转移到亚洲的部分地区。这一失衡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其正在加速。毫无疑问，过去十年间世界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亚洲引擎驱动的，尤其是中国工业生产非比寻常的增长率。2003年，中国工